

● 胡 寄 窗

关于社会主义须兼容商品经济的理论分析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明确而肯定地指示：“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指示在以废除商品经济为其传统的主导原则的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是一种划时代飞跃，甚至是一种革命，显示出能兼容商品经济的现代社会主义比传统社会主义具备更旺盛的生命力。当前世界的客观实践已证明：凡是能适当利用商品经济为辅助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能持续地稳定与繁荣；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恶化、政治动荡，甚至解体，是与他们以往未能正确认识和利用商品经济的辅助作用分不开的。因此，兼容商品经济的现代社会主义战略决策，将是未来若干世纪中指导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运行的带有根本性的政策方针之一。我们的同志，仅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认定为中国社会主义之“特色”，这是大大地低估了它在未来若干世纪中对世界社会主义运行的指导意义与作用。

但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形成，存在一个曲折复杂的长期过程。它不是在社会主义思想诞生之日起即伴随发生的，而是在坚决废除商品经济的传统社会主义观点的牢固支配下并在全力消灭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通过无数沉痛的经验教训，才总结出社会主义必须兼容商品经济的基本认识，当然也就有待于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新理论，作为当前和未来社会主义运行的理论依据。因此，在作出社会主义必须兼容商品经济的理论表述以前，有必要将以往社会主义者对待商品经济的传统观点和废除商品经济的苦痛经历，进行一些概略回顾，才能使人们真正体会到社会主义兼容商品经济这一认识上的巨大变革来之不易，从而由此发展出来的新理论更是经得起考验的。

（一）社会主义者对待商品经济问题的概略回顾 社会主义思潮自诞生之日起即以财产公有制代替财产私有制作为最根本的斗争目标，可以说不废除财产私有即不成其社会主义理想。为什么要反对财产私有？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常把社会罪恶的根源归结为财产私有特别金银货币的私有，于是宣扬财产公有和废除金银货币。所以，十六和十七世纪的乌托邦思想虽未明确提出废除商品经济的要求，而事实上已是否定了商品经济。十七和十八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中才有人公开谴责商业和商人，认为商业刺激起无数需要并引起奢侈，商人贪婪成性又没有祖国，故主张禁止经商。由此可知，空想社会主义者摒弃乃至谴责商业的思想自十六世纪以来已流传了300多年之久，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分析未能深入到商品经济问题的本质，而此思想传统却已是相当牢固的。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者马克思对商品经济持极为彻底的批判态度。他从商品细胞出发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剩余价值之特质并得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崩溃的科学论断。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体系从商品细胞出发展开分析这一点是非常特殊而又至关重要的，也是它有别于任何

资产阶级学派的经济学的特点之一。只有从这种以剥削为手段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出发，才能彻底地揭露资本主义的一切祸害如生产无政府状态、贫富两级分化、生产过剩危机、无产阶级贫困化及其等等祸害赖以产生的根源。因此，在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意识中，只有建立起不存在商品经济的新型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给劳动群众带来幸福。这在当时及以后的一切为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先进人们的思想意识中确实是天经地义的科学论断。在经典著作中，提及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先废除商品经济之处多得不胜枚举。如马克思指出：在社会主义下，“设想在交换价值，在货币基础上，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对他们的总生产实行监督，那是再错误再荒谬不过的了”。^①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更明确地指出：

“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②

由上可知，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对商品经济所持的否定态度远较空想社会主义者为更鲜明而坚决，因而构成继起社会主义者们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信念。

（二）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各国废除商品经济的经验教训 十月革命的胜利，布尔塞维克迫切地期望马上建立一个不存在商品经济的自由王国。他们于革命胜利后第二天就无偿的废除土地私有制并在以后3个月中以暴力没收银行、铁路及各大私营工商业改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其结果是使注册工业的生产总值较1913年减少了80%，工业生产几乎完全陷于瘫痪状态。特别是在农村实行“余粮征收制”，使农民拒绝向城市提供粮食商品，这对苏维埃政权威胁之大，远比孟塞维克的军队和国际武装力量之威胁要严重得多。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一直是一位力主废除商品经济的坚决马克思主义者。直到1921年初由于废除商品经济所带来的大堆甚至危及苏维埃政权的祸害，列宁才不得不改行新经济政策，即以“商品交换”代替产品经济。但列宁原来设想的所谓“商品交换”，仍是一种不用货币作媒介的交换，也就是不通过市场，不使用货币的直接物物交换，用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工业产品来交换农民的产品”，并说“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社会主义的基础”。^③但列宁的这种设想并未如愿，很快就为自发地市场商品买卖所代替。到同年秋季列宁自己也承认他所谓的“商品交换”失败了，必须用市场的商品——货币买卖方式以为代替。此时，列宁并非放弃了废除商品经济的基本观点，他只是把当时的惨痛经验归咎于苏维埃政权想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的政策失误；而恢复商品经济的新经济政策只是一种暂时的“退却”，是采取迂回的办法即利用商品买卖方式以恢复社会经济从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最后进入到共产主义时仍是要废除商品经济的。

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之初，曾引起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强烈不满。有人认为宁愿受冻挨饿也不愿搞国家资本主义，各国兄弟党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代表也感到不可理解：以一个埋葬资本主义为己任的革命突击队怎么能停止对市场商品经济的进攻？但列宁仍大力推行新经济政策，可以说商品经济的确在事实上成功地拯救和巩固了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所以，那时的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商品经济，在理论上是坚决主张要把它废除的，在事实上还得依靠它生活下去。这种在客观上既要利用商品经济以生活下去，而主观上坚决予以否定的悖理现象，在苏联新经济政策后的二三代马克思主义者中久已习惯成自然，从未在理论上感到困惑。然而这种悖理现象终于在长期中使苏联经济产生商品短缺、成长缓慢、效益低下以及其他种种弊端，终于导致苏联政权自行解体。

由苏联支持而建立起来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它们建国之初就吸取了苏联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废除商品经济的惨痛教训，使它们的国民经济未遭受到严重损害。但是，它们在苏联

的政治和经济模式的支配下，必然也同时要承受那种由悖理现象所导致的经济弊害，终于在90年代初先后发生剧烈政治动荡。

中国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过程。中共中央在解放战争接近胜利前夕就吸取了苏联早期消灭商品经济的惨痛经验，公布“城市政策”，使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尽管如此，斯大林式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自新中国建立之日起已被公认为支配原则，同时，利用而又否定商品经济的悖理现象也随之存在。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急于求进的思想开始滋长。1958年的“大跃进”在农村刮起“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否定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以致造成生产停滞、供应紧张，才稍事刹车，恢复农村集市贸易，迎来了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不幸又开始“文化大革命”，再次把商品货币关系与资本主义画等号，认定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严加限制。其结果是生产与思想两停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兼容商品经济的必要性有更明确的认识，制定了改革开放以搞活经济的英明决策。十二届三中全会又在几年来实行改革开放所获得成功的基础上，以党中央的决定明确肯定：“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关于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类似概念，在60年代中期已有不少东欧经济学家曾经提及，但均是个人观点尚未取得支配地位。而且从70年代初起由于集中计划原则又重新抬头，上述概念有的还遭到猛烈批判。因此，中共中央以党的纲领性文件明确肯定“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在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历史上是另一座重要里程碑。

通过对各社会主义国家废除商品经济的历史经验的分析，给人们留下一些很值得深思的问题。首先，以列宁为首的布尔塞维克们曾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运用自己掌握的政治权力尽一切努力以废除商品经济，但终于被迫暂时“退却”改行容许商品经济存在的新经济政策，这是什么道理？其次，在社会主义各国的建设时期，凡是对商品经济的控制较松弛时国民经济就会顺利发展，而对其控制较严时就出现经济的停顿甚至衰退，为什么会普遍存在这种现象？最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是彻底消灭商品经济的，但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莫不是自革命胜利之日起就大量存在着商品买卖，从未中断，为什么会出现此矛盾？与此有关联的另一问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既然一直在商品经济中生活过来，为什么在思想意识上总是坚决予以否定？对这些问题深入分析，才能有助于现代社会主义新理论之形成。要解答这些问题只须掌握一个要点：即商品经济的存在自有其本身的必要性，此必要性将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益牢固，绝对不会因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消灭，除非以经济彻底崩溃或回到原始公社为代价才能予以废除。社会主义经典作家对商品经济这一特质的认识是有缺点的，下面就谈这个问题。

（三）为什么经典作家均坚持社会主义必须废除商品经济 造成这种错觉的根源是相当复杂的，这里只举出一些我们可能理解的原因。

（1）历史的原因。社会主义最奇妙的传统理想是“各取所需”，无必要进行商品交换。（2）马克思理论体系从商品细胞出发，肯定资本主义必然随其商品经济所带来的致命痼疾而崩溃，因此，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为了不重蹈资本主义覆辙，必须废除商品经济。（3）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科技尚无特大发展，社会生产和生活也相对简单，这就易于让人们产生一种错觉，好象不存在商品经济社会生活仍可照常运行。特别是社会主义理想自其诞生之日起的基本目标就为了解决一般人民的生活问题，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更是以解决饥寒交迫的工人阶级的最低生活问题为其斗争目标。专为解决工人阶级的温饱问题，

即使废除商品经济也是可能做到的。(4)正由于斗争目标很简单,因而使人们将计划经济也看得较为简单。恩格斯就曾说过:“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无论生产和消费都很容易估计。既然知道每一个人平均需要多少物品,……那也是不难按照需要来调整生产了”。④列宁也曾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我国在1958年“大跃进”时就有人提出:只要公社社员每人每天有半磅牛奶和一斤多粮食即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生活真是如此简单,单靠集中的计划经济是完全可能实现的,不必要借助商品经济以为辅助。(5)任何一个天才思想家对未来美好理想的预测,有其光辉灿烂的部分,同时也会存在某种不足之处。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很多为争取自由而献身的志士仁人均将毫无拘限的自由作为其争取的目标,后来的客观实践证明这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目标,只有法律范围内的自由才是真正自由。同样,当时争取的绝对的平等也是不可能和不必要的,只有机会平等才有其可行性。何况马克思、恩格斯既未亲身经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在商品经济的预测问题上出现失误是无足为怪的。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在青年时代就追求一个能充分和全面发展自己才能而不受职业限制的理想社会,在那里“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牧畜”。⑤然而社会分工特别是大机器工业的长足发展,却使劳动者长期从事极为单调乏味的劳动操作,成为“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⑥这种极端憎恶社会分工限制了个人自由的情绪,也可能是马、恩坚持在共产主义下放弃社会分工从而废除商品生产的另一原因。以上这些原因虽然不够完备,但至少已能说明经典作家主张在社会主义下应废除商品经济的预想,不是毫无理由的。

(四)社会主义必须兼容商品经济的理论新论 到现在我们已知道科学社会主义是坚决主张废除商品经济的,故商品经济绝对不是也绝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的特征”或“内在属性”。只是由于十月革命以来的数十年中经历了无数次痛苦的经验教训,到80年代才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有兼容商品经济必要性与重要性。因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理论不可能从经典著作中找到依据,必须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实践中加以概括。50年代中期以来有的国内外马克思主义者曾对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的问题作出一些点滴的理论解释。由于这些解释均系在笃信废除商品经济教条的前提下提出的,即不是以经典著作中的分工理论尤其是大斯林式的两种公有形式的分工为依据,便是归因于旧社会的残余或生产水平太低,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所以要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理论,首先要求要能打破“废除商品经济”的传统,然后才能真正客观地从社会主义实践中概括出令人信服的理论。

但是,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下的运行虽有数十年的历史,而人们思想中彻底打破“废除商品经济”的教条的时间,在中国也还不到10年,因而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理论不会是很完备的,有待于丰富。下面是我们已认识到的社会主义必须兼容商品经济的几个重要理论根据。

第一,分工的精细化 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必要前提。无论社会分工或生产机构内部的分工均将随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而日趋复杂精细。就社会分工而言,在生产机构的内部,仅以一家钢铁公司生产的螺丝钉类型来说已不下数十种,如将全社会各行各业合并计算,其种类之多应以万计。现代在新形成的第三产业之外又将形成所谓第四或第五产业。总之,分工的前景肯定会越来越精细化,这也意味产品和劳务的种类也将日益增多。数以万计的不同产品或劳务各有其一定特质和功能,绝对不可通过中央计划方式来进行全盘合理的分配调拨。即使不考虑计划决策有时会产生主观的失误,仅就工作任务之繁重而言,已是集中

计划体制所难于完成的。再加处理此繁多的工作又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各种产品、劳务的特质又可能不时发生变化,时过境迁,原来合理的处理方式也会变成马后炮。而利用市场商品经济之运行,就能自发地分别调节各产品、劳务的这类事务。同时,由于不同类的或同类的产品或劳务的种类繁多,不可能由一个或少数几个基层机构或称“企业”来统筹生产,必须有无数多的企业才能分担此生产任务。这许多企业因产品种类之不同又各有其生产技术上的特点,从而各自形成为独立的生产实体。如何在这些数目繁多的企业之间及其产品之间进行分配调拨,又是中央计划机构的另一个无法处理之难题,只能让它们之间进行商品方式之交换才能自发地获得解决。因此分工的日益精细化,促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兼容商品经济来为自己处理无法全部由自己承担起来的分配调节任务。

第二,公有制形式之非单一性 不同所有形式之并存是产生商品交换的另一重要原因。如果此不同所有形式双方的一方是私有另一方是公有,或者双方均系私有制下的不同所有主体,则存在商品交换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双方均属于公有形式,其情况就有所不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中曾说过:商品交换早在不同原始共同体的尽头处发生,这是肯定不同公有形式间可以存在商品交换;他又说商品交换还可能“在同一共同体内的不同机构之间产生”,这是肯定同一公有制内也能产生商品交换,可惜这一点马克思未作进一步的说明。但由于经典作家对商品经济的最鲜明最坚决的态度是在社会主义下必须予以废除的,因此斯大林虽然确认全民所有与集体所有的产品交换是商品交换,但又羞答答地解释说这不是一般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商品生产”或只有商品的“外壳”。现在让我们把分析集中到全民所有制内部是否也实行商品经济的核心问题上来。经典作家所预想的新社会的所有制是单一而纯粹的公有形式,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好象“一座工厂”或如列宁所谓的是一个“辛迪加”。在此情况下,废除商品经济从事于产品的直接分配调拨完全有可能。但是问题在于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除梵蒂冈和列支敦士登而外,即使是在卢森堡和瑞士等小国家中,也不能使全国经济活动象“一座工厂”或一个“辛迪加”那样单纯,可以废除商品经济,统一集中地调配其产品。至于其他较大的国家如美、中等国就绝对不可能形成包括一切经济活动的单一纯粹的公有制形式。由于全民所有的各基层生产经营机构在技术条件和组织规模上有差异,各地区间经济发展条件之不平衡和自然资源之丰啬程度迥异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将使各基层机构耗费同等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产品,各具有其质量和功用的一定特点,不能视同一律。例如同是酒,中国各地酿造的酒就有几百种,而社会对它们各自的使用价值的评估之高低也是极不相同的,决不应不加区别地将它们当作同等产品进行统一调配,若对它们进行公正合理的区别,这又是计划机构难于实现的任务。另一方面,这些产品决不是单纯为本地和本单位的消费而生产,它们还须供应别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使用。这一大群受供应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可能近在咫尺,也可远在千里万里之外,因此,统一的中央计划调配方式无论规划得怎样周密,也很难使全社会需要此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均得到充分的满足。唯一的出路是容许商品生产与交换方式之存在,就可以轻易地解脱此困境。由于经典作家把公有制内部活动看得过分简单化,把它等于“一座工厂”,于是不存在社会分工,从而产生可以废除商品经济的错觉。事实上,以一个国家为范围的整个全民所有制内部决不会只生产少数几种产品,而是要生产全社会所需的成千上万种产品。每种产品及其生产机构各有特点与功用,这就会使全民所有各生产机构之间形成一种类似相互独立的社会分工状态,因而使商品生产与交换形式也成为必要。所以,不仅多种所有形式并存是产生商品经济的前提,而且公

有制形式的非单一性也要求商品经济之存在。

第三，社会主义联合劳动的计量单位无确定标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追随者一般公认：社会主义社会的联合劳动无须采取迂回途径即可直接形成社会劳动，而与任何其他产品的同一时间的联合劳动相等同。这是把联合劳动的计量方式看得太简单化了。在任何生产方式下，劳动的标准计量单位都是必要的。因为从共产主义的个人消费角度看，可以不必斤斤计较个人提供的和领回的劳动量的多少，但从全社会的生产资源配置来看，如联合劳动产品的调配没有一种标准的计算单位，将使整个社会经济效益达不到最优状态，甚至不时出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浪费和短缺等现象。马克思虽然一再提到会计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性，而对于会计中至关重要的标准计量单位却简单地理解为联合劳动的“时间”，绕过了一个最难处理的问题。其实，不仅资本主义工厂的工人个人劳动时间必须折算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能作为相互交换的标准单位，社会主义的联合劳动时间也得先折算成某种标准单位时间才能成为可以合理计量的社会劳动量。又由于联合劳动是许多不同熟练程度和体力强弱的劳动者的集体劳动时间所组成，故不同的联合劳动的一小时劳动时间不可能相等同，也就不能直接成为可计量的社会劳动，只有把各个联合劳动时间先折算为某种标准时间才能作为社会劳动的计量单位。从另一角度看，所谓“联合劳动”只是运用来区别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抽象概念，在社会主义车间中工人们仍是单独地在那里完成自己的劳动任务的。为什么他们各个人的劳动时间就不必要通过迂回方式转换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总之，忽视了个别的社会主义联合劳动必须先折算出其某种标准计量单位，然后才能组成社会劳动的问题，是一个很严肃的社会主义理论缺陷。然而要弥补此缺陷，决不是专靠集中计划就能解决的，必须在更广泛方面借助于市场商品经济的自发调节机制才能有效而顺利地解决此难题。

第四，资源秉赋与经济区位的差异 一般国家总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各地区间自然资源秉赋优劣之差异，国家的幅员愈广其差异愈突出，从而其所派生的问题也愈多。首先是各地丰畜资源的合理调配，关系到能否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的问题。其次，在某种资源极为丰裕的地区生产一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较欠丰裕的地区要小得多，不仅如此，某些拥有特优资源地区的产品的社会效用却可能较其他地区的同量产品大到数十百倍，例如长白山的野参和茅台酒可以为证。若不能将各种产品的生产劳动和社会效用作出适当的评估，无论对社会主义生产或消费都是不利的。最后，如果一国自然资源的种类很少，不难由集中计划机构来作出评估，问题正在于即使在一般中小国家中，这种基因于资源秉赋所产生的不同产品成本与效用之种类可能成千上万，这就不是集中计划机构所能有效完成的评估任务。关于经济区位之作用与意义既反映市区与郊区间的劳动成本与效益之差异，也反映全国各地区间的劳动成本与效益之差异。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向在平均主义思想的支配下，均忽视了区位经济问题，但区位差异事实上仍继续存在。例如，获致丰厚利润的市中心区行业并非完全由于它们经营技术的优良而利润微薄的郊区行业也并非全由于其经营技术之拙劣。至于各地区间之区位差异更是产品分配必须严肃考虑的问题。除须首先考虑产品在其他销售地区的有用性外，运输劳动支出是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如对此因素缺乏合理筹划，则京、沪两市也许就不能享用哈密瓜或广州香蕉。更为严重的推论是，任何地区的土产品均只能在本地区消费，则任何地区均不能消费别地的产品，那就是回到自给自足的简单原始生活方式去。但是，要由集中计划机构周密地考虑到各地成千上万的产品在许多其他地区的需要情况和规划出无法计数的合理运输成本，事实上又是难于办到的。不论是资源秉赋或经济区位之差异所造成的难题，倘容许商品

经济作为辅助方式而运行，即可轻而易举地得到解决。

第五，计划调节的微观局限性 计划调节的功能在宏观上更能发挥其积极的和决不可少的作用，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本质的关键问题，决不能因为商品经济能解决计划所不能解决的无数难题，而低估甚至否定计划的支配作用。计划调节无论在宏观或微观方面均可能产生失误尤其是主观的失误，而它的最不易克服的困难均出现在微观方面。其一，正如前面已多次提到的，现存产品与劳务的种类及其生产和分配的基层机构的数量的合计可能有数十百万，这还未考虑新的产品与劳务的出现数量。这是集中计划永远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不是问题的难度太大不易解决而是问题太多无法及时予以解决。再说，中央计划对许多微观项目只作出一些原则性规定，在执行时可能有很大出入；一些在计划中未规定的项目甚至非重点项目，常可能被忽视乃至被放弃。然而缺少一个被遗忘的螺丝钉有时会使一部庞大的机器停止运转。其二，制定计划最短的也以一年为期，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基于制定计划手续之繁难不得不如此。但客观势态可能不时发生变化使计划与事实脱节，而修改计划又需要一定时期。仅此时滞一端必然使计划缺乏适应客观实际的灵活性。此外，凡计划所规定的项目全是对未来事物预期，而未来之不确定性常使计划产生失误，更多的失误均属于微观项目，这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计划调节的微观局限性是计划机制本身的一个内在缺陷。它不象宏观调节项目那样是少数几个长期性的原则问题，纵有失误还有充分时间从事调整，而微观调节的是些短期项目，常令人措手不及。此内在缺陷决非计划机制本身所能克服的，但计划的微观调节是其宏观调节的基础，如微观调节存在局限性则宏观调节也难顺利运行，最后，只有容许商品经济之并存才能克服此缺陷，从而使计划的宏观、微观调节更能充分地发挥其支配作用。

以上这些理论诠释均属于封闭式分析，未涉及国际关系的因素。如考虑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的涉外经济关系，则社会主义兼容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是客观的必然，毋待解释。

我们所概括出来的这几条理论依据，虽系初步的探索不必完备，但仅就这几点已足以充分显示社会主义有必要兼容商品经济的重要理论意义。在目前情况下，这一系列理论诠释还另有其独特的现实意义。首先，许多一向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同志在苏联、东欧动荡局势的影响下，尽管我国的政治经济仍稳定繁荣，但以无理论认识为依据，难免产生其前途不可捉摸之感。一旦发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其充实的理论依据，自会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凝聚力。其次，中央领导同志曾一再对外表示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变，而在大多热心于对我国投资的外国和台港投资家的思想中，常有政策可变之焦虑。一旦社会主义兼容商品经济的理论形成后，改革开放成为商品经济的必不可少的活动方式，自无改变之可能，这就会消除国外投资家之焦虑而激励其对我投资的热情。最后，帝国主义者常把扩大市场商品经济作为对社会主义国家从事和平演变的基本策略。这是数十年前即已出现的对付教条社会主义的老办法。他们不懂得，现代社会主义正是要在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为主导的前提下，充分而适当地利用市场商品经济的作用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所以，市场商品经济已不一定是和平演变的有效工具，它还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辅助工具。

注：①《马恩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5页。②《马恩选集》第3卷，第323页。③《列宁全集》第32卷，第311页。④《马恩全集》第2卷，第605页。⑤《马恩全集》第3卷，第37页。⑥《资本论》法文版，中译本，第500页。